

新疆虽然地处我国边缘地带,但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也概莫能外。因此,借鉴叶敬忠教授倡导的“中心—边缘”的分析范式,从市场、科技、环境、政策等维度讲述后发国家边缘地带的农业生产故事^[4],深入分析中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以及边缘国家内部中心地带与边缘地带的“互动”,或许可以发掘出新疆棉花产业发展的动力机制。

(李万伟系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博士研究生,邮编:211100。)

[参考文献]

- [1] 贝克特. 棉花帝国:一部资本主义全球史. 徐轶杰,杨燕,译.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9
- [2] 奥斯特哈默. 关于全球史的时间问题.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56-62
- [3] 刘新成. 互动:全球史观的核心理念. 全球史评论(第二辑),2009:3-12
- [4] 叶敬忠. 发展的故事:幻象的形成与破灭.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乡村的现状和未来 ——首届“‘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国际论坛”会议综述

冯璐 曾艳 赵鸭桥 唐丽霞

2018年11月7日至9日,由中国农业大学、云南农业大学和“一带一路”南南合作农业教育科技创新联盟主办的首届“‘一带一路’乡村振兴国际论坛”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勐腊县勐伴镇河边村召开。来自英国牛津大学、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印度阿育王大学、孟加拉农业大学、缅甸蒙育瓦经济大学、泰国清迈梅州大学、越南太原农林大学、印度尼西亚大学、马来西亚大学、柬埔寨全国国土管理委员会、老挝农业部的农村发展知名学者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国农业大学、厦门大学、云南农业大学等国内农村发展的专家学者共11国45人参加了此次论坛。

此次论坛将主题聚焦于“中国与南亚东南亚乡村的现状和未来”,涉及“一带一路”乡村振兴中的重点、难点和热点问题,分别围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乡村变迁”“土地政策与乡村振兴:国别案例分析”“农业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主要的问题”“乡村转型的政治经济学”四个议题展开讨论。与会专家分享交流了各自国家乡村转型的现状、挑战以及相应的政策问题,并最终形成中国-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研究网络成立倡议。

一、发问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

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指出“全球经济复苏态势有望延续,我国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空间将进一步拓展,同时国际农产品贸易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提高我国农业竞争力、妥善应对国际市场风险任务紧迫”。我国于2014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并且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和债权国,经济发展迅速在全球有目共睹。但是,我国海外投资数额与美国、日本相比有着很大的差距,以日本为例,到2015年3月日本的海外投资额就已达62399亿美元,远大于中国对外投资数额,增速势头迅猛而且多集中于东南亚地区。这反映出我国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仍然较弱,而这种能力的强弱,既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对全球经济走势和发展的影响力,也反映着一国或地区利用全球资源来优化本国或本地区资源配置的能力,保障本国或本地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是开放型经济国家在发展中追求的一个重要目标。

与此同时,规划指出我国“国家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日益增强,对农业农村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快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乡村振兴具有雄厚物质基础”。从长期看,中国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必然呈现出三大趋势,即农业农村优先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农业农村现代化综合发展。中国的农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仍面临着农产品需求增长、自然资源退化、生产力增长乏力、生产经营规模小、劳动成本上升、气候变化、价格波动等巨大挑战。未来食物供需缺口将逐渐增大,食物安全问题将日益突出。未来中国至少在20年内农产品需求还将出现刚性的增长,而水土等资源将是永久的刚性约束,这两种刚性变动都是未来难以改变的趋势,要提高食物和农业安全的保障程度,国家需要把战略重点聚焦在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上,需要在国家食物安全上根据国家总体利益做出战略的调整,同时还需要充分和有效地利用好国内外的农产品市场。

南亚东南亚国家多数为农业国,但综合经济实力差距较大,2017年人均GDP数据显示:马来西亚和泰国经济实力较高,分别为9 944美元和6 593美元,中国仅次于马来西亚为8 836美元,虽然印度仅有1 939美元,但印度作为南亚大国的实力依然不容小觑。同时,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在乡村发展的做法上也各有特色。那么,南亚东南亚的乡村振兴如何理解?有哪些实践形式?与我国的乡村振兴有何借鉴之处?各国专家如何看待中国的乡村振兴?因此,此次论坛的召开不仅是探究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实践,探讨我国乡村振兴之路的学术意义,更是了解国际市场助力我国全球经济资源配置能力提升的现实意义。

二、探究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

(一) 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乡村变迁

中国重塑城乡关系,乡村社会经历政策制度变迁。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农村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等问题,造成城乡发展不协调。而中国的现代化

进程的快速发展,在相对较长的和平时期,出现大规模的城镇化发展,从政府到民间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准备,以至于问题迭出。这种转型使得当下的乡村社会在经历现代社会转型与变迁之后显现出后乡土性,亦是制度上的变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润生农村发展公益基金会理事长徐小青在“中国乡村振兴的主要方向与发展政策”主题发言中提出,我国乡村振兴近期目标之一是基本形成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乡村振兴战略最主要的政策目标是在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防止乡村衰败和重塑城乡关系,在农业发展、农村民生、精准扶贫等方面做好政策改革。

中国农业减贫实现农村发展,乡村变迁亦是贫困变迁。农村发展离不开扶贫,中国和大多数东盟国家在扶贫方面都有类似的经历。东盟国家的减贫很重要,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减贫更有力。截至2015年底,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仅有5 575万人,提前5年实现了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的贡献率超过70%。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乡村变迁就是减贫的发展历程。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以“中国与东盟的增长、改革与贫困”为题,比较中国与东盟国家的贫困变迁并探讨减贫的驱动力。他指出农业发展在中国减贫中举足轻重,如农业产业化和农业结构调整,而农业发展在东盟国家减贫中仍是制约因素。李教授提出三种扶贫途径:一是通过快速经济转型,确定消除农村绝对贫困的战略;二是发展农村;三是综合治理多维贫困。并认为对于一些东盟国家来说,要为减贫创造足够的空间,在考虑人口增长时,农业部门的生长必须高于目前的3%~4%。由于没有额外的土地用于农业活动,增加现有农场的产量至关重要。提高生产力、促进农村工业和发展小城市是减贫举措的关键途径。对中国而言,中国是该地区重要的参与者,通过与东盟国家的农业部门合作,以及发展小型农村企业来改进减贫战略大有潜力。

印度实施逆向土改缓解矛盾,产权制度改革推进乡村变迁。印度没有经历中国如此大范围 and 深度的土地改革,电力供应也没有中国的

丰富,目前矿物煤还是替代电力资源用以实施水利灌溉的主要资源,全国仅有35%灌溉土地,其商品化和农业投入都远低于中国,但印度的农业补贴却是中国的两倍。同时,女性劳动力占40%~70%但收入则只占男性的1/3~2/3,社会性别差异较大。那么,在这样一个社会发展背景下,印度如何实现乡村振兴?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暨牛津大学发展学荣休教授Barbara Harriss White以“印度的农业发展与乡村的未来”为题,指出印度农业发展过程中的矛盾,主要是绝大多数印度农民作为小生产者同时占据了相互矛盾的阶级资本和劳动力,即劳动阶层的辩论:农业是否仍然具有宏观经济作用?并由此形成土地资本与农业生产企业的矛盾,农业劳动力在农户生计和农业发展规划中的矛盾,尤其是“最后一英里”(刘易斯陷阱)问题。而且印度国家粮食安全目标尚未解决,发展资金不足等都需要持续补救。因此,农业愿景提出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生产力等,更提出由企业部门主导实施“逆向土地改革”的产权制度改革。这不同于我国以农户为主导的土地改革,此举可以缓解土地资本与农业企业的矛盾但仍有风险。

(二) 土地政策与乡村振兴:国别案例分析

土地确权防止土地权利叠加。“三农问题”以农民为本,而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可靠的保障则是土地,土地对人口密度高且资源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尤其重要。农户作为土地政策实施的主要参与者,其认知程度的高低以及行为决策的结果决定着土地政策实施的有效性。

泰国传统上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地所有权,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收集木材、食物、草药、林产品等,在一定程度上,一个村庄的农户都可以共同使用森林资源并称为“社区森林”。但当人口规模扩大时,土地所有权意识得以发展,19世纪时国王已将土地作为奖励赏给臣子,20世纪才正式引用土地所有权的概念,1924年开始正式注册私有土地,自1974年开始公有土地和私有土地的确权工作以来,因大量公有土地被农户占据而困难重重,并引发农户与政府组织的抗议。清迈梅州大学行政学院Bongkoch-

mas EK-Iem 副教授在“泰国的土地改革与乡村发展”中指出,土地权利的叠加是泰国土地所有权发展中的主要问题,但由于土地私有制其改革亦是举步维艰。

2013年,中国两会土地改革明确提出:农村土地确权保障农民权益,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其中,把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确认到每个具有所有权的农民集体,依法明确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代表,更是将土地确权明晰化具体化。九三学社中央毫不讳言称“只要走好农村土地登记确权的第一步,征地制度改革条件就基本具备”,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土地政策应已实现提前规划。

土地的多功能性开发。土地利用功能的多样性是评价土地利用变化对其功能影响的重要概念和方法体系,实现土地资源高效利用缓解土地供需矛盾,促使土地利用的研究由土地利用格局转向土地空间多功能性变化及其可持续性的方向。马来西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国际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历史系Shakil Yacob教授以“多功能性和乡村复兴——马来西亚联邦土地发展局(FELDA)案例研究”分享了马来西亚的土地与乡村变迁。

20世纪70年代,FELDA就开始实施土地安置计划,合并利用不经济的土地来推动土地改革,并采取多管齐下或多部门协调的方式,促进减贫并提升土著在经济发展中的参与度。20世纪90年代,马来西亚农业以多功能性为主发展乡村经济,对农业部门采取高度支持和保护措施,通过国家对农业部门的干预,促进积极的外部性、消除社会利益的负外部性,打造“乡村传统和社区发展”并大范围推广。这在马来西亚油棕产业发展中体现较充分,并成为世界银行在其他发展中国家仿效消除贫困的榜样。FELDA鼓励油棕种植获利,并实施油棕安置计划,项目实施的定居者比普通稻田农民多赚5倍,比橡胶定居者多1.6倍,稳定支持马来西亚橡胶产业的转型。Shakila Yacob教授认为在FELDA案例中,多功能性是通过本地嵌入式农业发展模型复兴乡村建设,并实现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功能的统一。

(三) 农业-工业化/城市化与乡村的主要问题

规划指出: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以及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深入推进,乡村发展将处于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要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根据不同村庄的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等,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不搞一刀切。而各国在乡村振兴对经济的发展能否推进农业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方面,也因发展机制不同,作用和途径也大相径庭。

城市化快速增长改变乡村风貌。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发展系主任 James Putzel 教授以宗族政治、农业发展条件、去工业化的城市化、民粹主义的未来可能性为线索,分析了菲律宾农业城市化和未来发展。如今菲律宾的城市化发展受到政治不稳定因素的影响,未来充满不确定性。但是,菲律宾仍然是亚洲城市化率发展最快的城市之一,到 2050 年,约有 65% 的人口将居住在城市,而马尼拉以外的中心城市人口增长将达到 3.9%,乡村的气息日益减退。他认为没有工业化的城市化会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形成商品走私等为主的“无效增长”。在这一点上,菲律宾的城市化实践经验在形态上改变了乡村风貌,在治理上体现城市水平,因此,城市化一旦快速增长,其形态能否保留原貌已不能确定。

农村区域市场化发展促进乡村城镇化转型。市场化是农村区域发展的重中之重,其市场主体必须放回农村本身,坚持城乡融合发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坚持乡村振兴要完善城乡布局结构,以产业发展推进市场化。目前,我国城镇化进入快速发展与质量提升的新阶段,但仍参差不齐且问题突出,南亚东南亚国家亦如此。印度阿育王大学社会学和人类学系 Mekhala Krishnamurthy 副教授认为“农业商品市场是发展的核心”,并分享了印度农村社会生产与消费、农业与非农经济、农村与城市、生存与积累、经济增长、社会再

生产、经济社会变迁几方面的问题。她提出印度农村区域发展需要从合作社到厂商公司,建立多样化和扩大规模,并确定土地和生计,城市和农村的关系。柬埔寨全国国土管理委员会副秘书长 Prak Angkeara 表示柬埔寨的乡村城镇化发展应提高农业公共项目的质量,并将资金投入更有效的项目中去,减轻农业部门的监管负担。孟加拉农业大学 M. Hammadur Rahman 教授通过分析孟加拉的乡村转型,认为农村城镇化的主要领域是农村人口的降低、农业结构与资产的市场化、城乡教育提升和差距的缩小,并改善农村卫生。

(四) 乡村转型的政治经济学

精准扶贫下的中国乡村贫困治理。农村贫困治理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议题,精准扶贫与传统扶贫模式不同,具有更强的实践性和制度的针对性,是目前中国农村贫困治理的根本之策。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唐丽霞教授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 18 个极贫地区的确定标准,讲述到 2014 年贫困标准的演变,总结了贫困地区“从上而下”分配式和“从下而上”参与式的混合式精准扶贫措施,她认为此措施提高了定位的准确性和扶贫效率并降低成本,为不同的贫困单位提供具体支持,为监测和评估减贫提供了技术解决方案。但精准扶贫也在贫困和非贫困户中形成了新的失衡点。经济管理学院方向明教授则从中国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角度,探讨农村贫困治理,她认为儿童营养摄入量的增加是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影响儿童健康的主要途径,而且在当前阶段,新农保改善农村老年人主观福利的主要原因并不是物质层面的经济支持,而是精神层面的信心与保障,因此农村治理更多的是身心的健康。

社区式发展剖析农村贫困。孟加拉在 2010 到 2016 年期间 GDP 年均增长率 6.5%,但全国贫困人口仍然占 24.3%,其中城市减贫率接近 0.4% 而农村则高达 1.5%,减贫步伐放缓与经济增长和不平等加剧有关。在此,牛津大学 Shapan Anan 以孟加拉农村贫因为例,认为不仅要为减轻贫困提供更多资源,也需要创新的政策干预,保障社区公平的发展制度。老挝农业部扶贫基金项目监测与评估处处长 Hat-

tachan Phimphanthavong 介绍了老挝社区参与式减贫基金项目的实施进程,充分了解农户需求发挥基层民众的权利;印度尼西亚大学 Ricardi S. Adnan 教授分享了由政府机构或国际基金赞助社区发展式乡村减贫经验;越南太原农林大学农业推广系主任 Nguyen Huu Tho 剖析当前越南减贫的主要措施并认为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各级政府的政策支持、减贫社会化并赋予当地农户适当权力。

农业生产结构调整的贫困治理。农业生产结构调整无论是在长期还是短期都具有明显的减贫效应,中国和南亚东南亚国家均为农业国家,中国在实施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措施的同时,南亚东南亚各国也主要以农业生产发展为主要手段开展贫困治理。缅甸蒙育瓦经济大学经济学系 Thar Htay 教授通过分析缅甸实皆省干旱地区乡村贫困成因,提出缅甸农村贫困形成的主要原因有传统耕作方式简单、市场化运作差、信贷系统信誉较差等,但最关键的还是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不符合市场的发展。孟加拉大学农业推广系 Hammadur Rahman 教授同样认为孟加拉的减贫需要政府政策的保障和持续性的投资政策,降低经济脆弱性,保障粮食安全,更要加速农业生产多样化即农业生产结构升级。

三、有序协力推进乡村振兴

此次会议本着对中国和南亚东南亚乡村振

兴研究的学术关怀,不仅为各国学者搭建了互动交流的平台,更通过与会者切身感受中国农业大学李小云教授“小云助贫中心”实施的“河边村助贫模式”成果,促进学者们更好地审视自身的研究、探究研究价值、突破研究瓶颈。此次会议涉及土地政策、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等多个学科领域,参会者对各国乡村城镇化(Urbanization)、乡村复兴(Revitalization)、乡村转型(Transformation)、乡村减贫(Poverty Alleviation)发展过程中的制度改革、土地开发、扶贫减贫、农村城镇化、乡村治理、结构调整、社区式发展等诸多问题开展了热烈探讨,而减贫、土地、农业、城镇化则是最核心的四个关键词。其中,中国的乡村振兴之路亦是四十年减贫之路,这一过程体现了现代性、小农生产方式和乡村社会关系的交织作用,减贫对于其他国家的乡村振兴亦是作用重大。

因此,本着共同探讨乡村振兴发展道路的学术情怀,中国农业大学南南农业合作学院院长李小云教授与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鸭桥教授,共同发起并宣布“中国-南亚东南亚乡村振兴研究网络”成立倡议,并就乡村振兴中需要研究的重要问题定期举办国际研讨会,有序协力推进乡村振兴。

(冯璐系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亚东南亚农村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通讯作者唐丽霞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邮编:100094。)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与可持续性社会^① ——“第五届东亚地区农业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综述与展望

李禾尧 闵庆文 刘某承 张碧天

自2002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发起旨在保护全球范围内的典型传统农业系统的全球

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保护项目以来^[1],截止2018年11月底,全球范围内已有分布在

① 农业农村部国际交流与合作项目“2018年中国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项目”。